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 鲁 日 记

理红 理京 整理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鲁日记/理京,理红整理.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4.1

ISBN 7-81074-616-2

I. 高… II. ①理…②理… III. 高鲁-日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019 号

书 名	高鲁日记
整 理	理 京 理 红
责任编辑	理 绥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 蒙 古 地 矿 印 刷 厂
开 本	880 × 1230/32
印 张	26.625
插 页	8
字 数	700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1074-616-2/K·47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高鲁 (1921. 7 — 1989. 12)



1938年10月高鲁在延安



1937年9月冼星海与王云阶、高鲁、夏先生在武汉的合影



1937年10月26日海星歌咏队与冼星海在武汉的合影（三排左起第一人为高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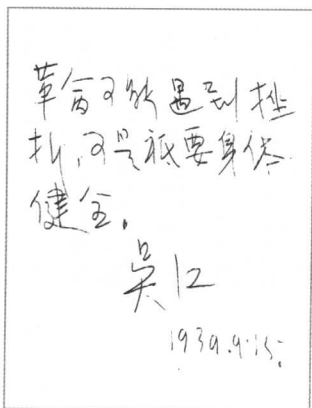
1939年春高鲁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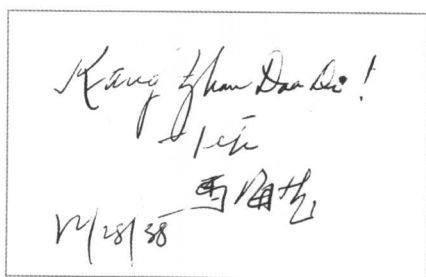
1940年贺龙同志给战斗
剧社高鲁日记本上的题词（原
件存晋察冀文艺研究会）



1939年春鲁艺美术系教员王式廓
为高鲁所画素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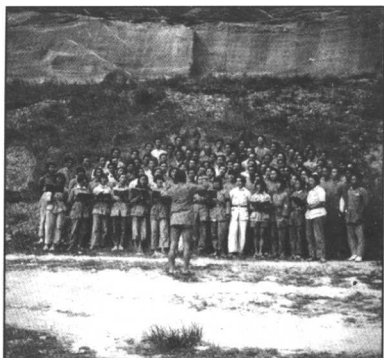
吴江同志在高鲁日记本上的题词



1939年马海德同志在高鲁日记本上的签名



1939年夏鲁艺音乐系、文学系同学合影



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艺学生排练《黄河大合唱》



高鲁保存的张闻天在晋西北农村调查时的照片（原件存新疆博物馆）



1939年鲁艺师生合影



1939 年鲁艺师生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原件存新疆博物馆）



1942 年高鲁参加晋西北农村调查时的照片



高鲁保存的朱德与八路军战士的照片（原件存新疆博物馆）



1945 年冬高鲁在左云县，前排右一为高鲁



1944年高鲁、赵戈、李茂田在晋绥党校



高鲁日记本封面



1942年4月28日高鲁收到全家的照片，并在当天的日记中描述了极为高兴的心情。此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



高鲁保存的晋察冀边区粮票（原件存新疆博物馆）



1945年任左云县四区区长的李晋藩同志



高鲁和家人的合影



高鲁与成荫、申仲、梁定商、
李云生等同志



高鲁与叶林、刘沛、王天一等同志



高鲁与霍健、刘伍同志



高鲁与梁定商、张涵、马勇、
马友梅同志



韩燕如（雷烈）同志



高鲁与樊康、田冲同志



高鲁与稼雨、叶林同志



高鲁与杨健林同志

周家寨，六十五户。只有六户无地，最少有八顷地，叫温海生。的没地租地。的顷地较歇地，有十年八季种一回，有三五年种一回的。普通的有八九亩地。最少有八亩。占三分之一。下余都在十亩八亩。一般中农种地，土地质量好坏相差很远。孙永泰有八九顷地，还给别人挖工，自己种种十亩，打下喂了牲口。

海生种四五顷地，租粮有九斗八升，全村数他的牛最好，只有老大受，老二老三不受，仍两个牛工。

武号家有五亩，今年能打两石，不够吃。

这里有如粮地叫~~白~~去川河沿。温海生的粮地，歇歇地不出租。水窑边，赁给各户，赁粮和赁户，赁地赁他不要，硬甘到他不租时，他愿意要他的地。以川河沿都是粮地，地亩好地。的区土地最集中者会合炭宋兰有三十顷地。

曹家嘴魏直、魏的里、魏光，都是大户，有的有顷多地。

大路坡时世官自种七八顷地，石粟沟李福也种地不少。

群众说：养不死穷汉，富不了富汉。这都靠地利，赁粮产来的。低防斗徐门大户，租佃赁多关系。

群众分到地，同租同出，还租不到，要出公粮时，才差不过了。地亩的地况就不同了。以宋一下出廿五石石粮，他也不卖地，他以油坊一冬，没出出石石粮，也卖地出二十石石粮，他今年种八顷多地，大几十人吃饭，他也出得石。海生种五顷多地，打三十石石粮，还出九石石公粮。

群众不敢买地，怕用票子买下，八路军在不住地闹鬼。

高鲁手迹

序

冼妮娜

在高鲁同志逝世十四周年之际，我怀着极不平静的心情，读完了即将付印的《高鲁日记》稿。

高鲁同志有两个遗愿。一是寻找参加革命后失散的亲人，一是整理他写下的大量日记。1991年中秋节，他散失了53年的弟弟妹妹从台湾归来，与高鲁的妻儿们团聚了，这终于让高鲁的灵魂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现在高鲁的家人又遵从他的遗愿，将高鲁从1938年至1948年的日记整理出来，即将出版。这些封尘很久的日记记录他的革命生涯，也客观详实地记录了他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革命实践，这些都是极有价值、极为难得的历史资料。据其家人说出版此书的目的主要是将此书捐献给高鲁工作过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或者是捐赠给高鲁的战友们，这是一个普通革命者对人民的最后贡献。高鲁已长眠于祖国大地，但他可以含笑九泉。高鲁的家人约我为此书写序，高鲁是我父亲冼星海的学生、战友，是我母亲钱韵玲的战友、同学，为《高鲁日记》写一些话是我的责任。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在那如火如荼的抗日形势下，上海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组成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服务演剧队，我父亲同洪深、金山、王莹等人士组成演剧二队，奔赴内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经苏、浙、皖、豫、鄂等省后抵武汉。我父亲沿途广泛组织歌咏队，有近百个歌咏队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其中“海星歌咏队”也是我父亲组建的。他亲自训练人员，教唱歌曲，教习乐理，指挥演唱，使这个歌咏队成为一个干部训练班。高鲁就是在这时参加了歌咏

队，他与我母亲钱韵玲都是我父亲的学生，又是队友。后来该队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编制下成为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参加过抗日宣传周、水上火炬大游行、为抗战募捐义演等活动。1938年11月我父亲母亲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自安排下抵达延安，受聘于鲁艺音乐系，翌年任系主任。我母亲在鲁艺高级研究班学习。这时，高鲁从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牺盟会决死队转辗到延安，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并任系秘书。这些老朋友才分别一年，在鲁艺又相遇了。

高鲁原名为王铿铎，到鲁艺后立志以高尔基、鲁迅为榜样从事文学与创作，因此改名高鲁。他从写日记入手，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从那时起，他写日记，持之以恒，从未间断。久而久之，写日记成了他生活的一大要素。到了晚年，他坐在轮椅上整理着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大量日记。整理这些日记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一页页地翻看着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上记载的往事、人物，如同放映电影似的浮现出来。他常借此反思自己的过去，思念自己的战友、同志、同学、同事。这些人有的健在，有的已经牺牲。这位白发老人在整理日记时完全沉浸在对革命年代的回忆之中。

高鲁的日记本是用规格不同、质量不同的纸张订成的，书写的字迹也不尽相同。他用这样简陋的书写工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写下了大量日记。在延安和其他地方，他努力地搜集马粪纸一类的纸片，甚至是利用废旧的书本，将它们舒展开来订成大小不同的日记本。高鲁将这些革命日记视为珍宝，这也反映出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1939年9月，高鲁随吕骥等同志赴华北抗日前线，筹建华北联大。高鲁为了轻装行军，把心爱的日记存放在我父母亲的窑洞里，请他们代为保管，如今这些都成为珍贵的记忆。

高鲁在延安曾参加过我父亲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的首次公演，我父亲安排他担任“领唱”，当黄河船夫们战胜黄河的惊涛骇浪、胜利抵达彼岸时，高鲁按照我父亲指挥的手势带头发出内心的欢笑，随即参加合唱的其他人员（即那些勇敢的船夫们）也跟着发出爽朗的大

笑，哈……，那笑声将胜利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此参加合唱的人送给高鲁一个绰号“领笑”。

高鲁在鲁艺是与我父亲交往密切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在日记中也时常提到他的名字，记载了他们的工作和友谊。在鲁艺期间，高鲁常随我父亲到抗大等单位演出，他们经常谈心。我父亲十分关心他的进步，曾送给他《铁流》、《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等书籍。我父亲在《铁流》的扉页上勉励高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继续前进”。在高鲁离开延安后，虽然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工作繁忙，但他们书信往来不断，直到我父亲被派往苏联执行任务后，他们的交往才被迫中断。高鲁对我父亲怀有无限的尊敬，这种情感难以割断。1983年1月，党中央将我父亲的骨灰从苏联运回祖国安葬，高鲁因病不能到北京参加迎接仪式，但他在病床上发出了数百字的唁电，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无限怀念。文革以后，他与我母亲取得了联系，他们经常书信往来，回忆过去的革命岁月，相互地问候。高鲁逝世后，高鲁夫人张爱婷同志到杭州疗养时，还看望了我的母亲钱韵玲。60多年过去了，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革命友谊啊！

现在高鲁日记就要出版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拜读了这本朴实无华的日记，使我感到亲切，使我感动。我感谢高鲁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以坚韧的毅力写下了不寻常的日记。我感谢高鲁的家人，他们出版这本日记是对高鲁最好的缅怀和纪念。我相信，《高鲁日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革命史资料，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教材。关于《高鲁日记》的内容和出版的意义，郑力哲先生在《关于高鲁和他的日记》一文中已有详尽的论述，这对我们阅读高鲁的日记会有一定的帮助。

二〇〇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于杭州

序

韩燕如

我和高鲁同志是60年前的战友。1942年我在整风后不久,就和甘惜芬、丁基、高鲁同志参加了张闻天同志组织的农村调查。1944年又与高鲁在中共晋绥党校参加了抢救运动、两忆三查。1950年,高鲁同志离开内蒙古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外交专业,这期间,我们没有来往。

1964年,高鲁同志从新疆回内蒙古工作,我去看望他,坐在他简陋但四壁皆书的卧室内,谈起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我听说他因“一封海外来信”而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便问起此事。他却极其乐观,说道:“能活到现在已经不错了。丁基、高翔不都牺牲了?你也不是皮开肉绽,捡了条命吗?”他淡淡地笑后便陷入沉思中。我比高鲁大六七岁,却有相同的境遇,我们参加了伟大的革命,也经历了激烈的“党内斗争”的考验。高鲁说到的高翔同志我不熟悉,但丁基同志是牺牲了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也是我的亲密战友。解放后,他的母亲在西安还盼着儿子回来,但年轻的儿子已为革命牺牲了!对此,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我想这就是高鲁沉思的原因吧!“哎,不说这些了,还是说你的爬山调吧!”高鲁说着顺手从书架上取下我的《爬山调选》。对此,我很惊奇。这书的3册是3分年出版的,他在新疆竟都买全了。他得意地说:“我常跑书店,见了老韩的大作,我能不买吗?”他喜欢读书学习,藏书甚丰,这在老同志中极为少见。那天,我们谈了我开始收集民间歌曲和爬山调的事。十几年没有见,还很投脾气。他是鲁艺培养的老同志,具有文化人的品格。我说他是个“四不像的老干部”,但他是个具有很强文化气质的老同志。他常年在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工作,

对这里的方言也很熟悉，我们聊天时，他能用方言唱出爬山调来：“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要想亲戚朋友拉一把来，酒换酒来茶换茶”。高鲁狷介耿直、疾恶如仇，这也让他吃了很多不必要的苦头，但他还是那样坚强、乐观。其实，他从来没有跌倒过。

文革过后，我恢复了工作。出版社要重版我的《爬山歌选》，让我做必要的修改。而我的家几经抄查，这书一本也没有了。我想到了高鲁。他将自己收藏的《爬山歌选》慷慨地送我。他惜书如命，我知道这其中有很深的情谊。后来我的书再版后，我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新书送他，他却还向我追要那套 50 年代出版的《爬山歌选》，说“那套书选入的爬山调多”。

我知道他喜欢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60 年前，我们在晋西北农村调查时，他就整天地记呀，写呀。1982 年后他在医院住着，我多次去看他，他说是在整理那些日记，整理好后要给我读。

最近，高鲁的儿子将整理好的《高鲁日记》稿送我，说其中也写到了我，请我作序。我说，这些日记该出，不然，高鲁写这么多日记作甚？如果，高鲁能看到自己日记的出版，还不知道怎样高兴呢？

关于高鲁和他的日记

郑力哲

《高鲁日记》是一本普通革命者的日记。

高鲁(1921.7—1989.12),原名王铨铎,满族,出生于武汉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36年8月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6月到山西参加牺盟会决死队,1938年转辗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任文学系秘书,1939年7月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1940年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战斗报社任演员、记者、编辑,1943年后在山西河曲县、左云县、右玉县、内蒙古凉城县任文化部长、民政(教)科长、秘书等职。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毕业后在新疆、内蒙古等地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者。因为没有千千万万的象高鲁这样的职业革命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所以称高鲁为“普通的职业革命者”大体允当。

从高鲁现存的日记来看,他1938年在延安鲁艺时就开始写日记了,在解放后,他仍然坚持写日记和工作笔记,现存者即有200万字。1959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筹备处征集革命文物,征集了他的37件日记和笔记,这些日记和笔记的写作时间从1939年至1945年。经多次查找,确认这些日记、笔记已经佚失,仅余13件照片。倘将这些文字计入,高鲁日记的总数便更为可观了。

高鲁的父亲是小职员,但有相当的文化程度。高鲁少时好学但因家境贫窶失学,不久因抗日救国而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的延安是革命的圣地,鲁艺是抗战时期我党培养文化干部的学校,是左翼文化人士